

製造儒家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

Lionel M. Jensen

儒家

〔美〕詹启华 著 徐思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制造 儒家

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

〔美〕詹启华 著 徐思源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40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美）詹启华(Lionel M. Jensen)著；徐思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4
（先声文丛）

ISBN 978－7－301－30229－3

I. ①制… II. ①詹…②徐… III. ①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1290 号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by Lionel Jensen
© 199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9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 ZHIZAO RUJIA: ZHONGGUO CHUANTONG YU QUANQIU WENMING
著作责任者	〔美〕詹启华(Lionel M. Jensen) 著 徐思源 译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229－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577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33.5 印张 466 千字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献给我的父母，他们以自己的深爱给了我生命；

献给苏珊 (S u s a n)、汉娜 (H a n n a h) 和埃琳娜 (E l e n a)，

她们不仅给了我一切，同时也告诉了我其幸福愉悦的意义。



先声文丛

知 识 的 力 量 ， 人 性 的 光 辉

致 谢

本书主要内容发轫于笔者研究撰写博士论文之时,该文于1992年提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和先期的读者提出的批评与建议非常宝贵,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对论文的首批读者——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唐·普赖斯(Don Price)、吉德炜(David Keightley^①),特别是耐心指导我博士论文的导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笔者感激不尽。

大概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会像写作一样孤独,但因为有许多师友和学界同仁的鼓励,我却少有此感。其中需要着力介绍的是孟旦(Don Munro)和田浩(Hoyt Tillman),他们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总给我带来思想上的启迪,给予我适时的鼓励和中肯的批评。我希望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没有辜负他们,并能反映出它确实从两人多年的指导中获益不少。对于孟旦给予的宽容以及学问上的帮助与支持,我谨报以最深的感谢。

孟德卫(David Mungello)看过本书的部分内容,他提供的帮助已远远超出了笔者对一般读者的期望。他对此书抱有兴趣并提出过详细而敏锐的批评,还一直很关心笔者个人的身体健康,对此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的挚友苏源熙(Haun Saussy)热心为本书润色。本书终稿如果能有一得,一定程度上也是拜其天才的建议所赐。

我还想感谢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几位导师:首先是杰勒

^① 詹启华在“致谢”部分提到的人物,如有惯用中文名,译者将尽力译出,限于学力,恐有遗误;另有部分中国人姓名,难以查实,故保留汉语拼音,以免讹误,以示尊重,并祈见谅。——译者注

德·卡斯帕瑞(Gerard Caspary),另外还有马蒂·杰伊(Marty Jay)、杜维明、埃尔文·沙伊纳(Irwin Scheiner)和吉恩·伊尔斯切科(Gene Irschick)。当然,我最不应该忘记我的第一位研究生导师,也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华盛顿大学的乔治·哈奇(George C. Hatch Jr.)。正是在他的支持帮助下,我才得以一窥汉学的堂奥,竭尽所能地学习与中国传统思想史有关的知识。也正是他滋养了我研究汉学的热情,并对我严加训练。很多xii 次我都和他在一起通宵达旦地讨论司马迁、孔子、“北宋五子”、苏轼、朱熹和王阳明,对此我将常铭感激。作为一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学者,乔治·哈奇虽然特立独行,但在指导学生从事研究方面无愧师范,和宋代的程伊川(程颐)不同,“他有人情”(译者按,此句与“万岁”一词均为詹启华所用拼音转写)。我衷心祝愿他“万岁”。

多年来,还有很多人对拙作提出过建议批评,对此我谨报以最真诚的感谢,一并申谢如下:白露(Tani Barlow)、白诗朗(John Berthrong)、迈克尔·贝斯(Michael Bess,一直源源不断地给我带来启发、指导和改变)、包弼德(Peter Bol)、白牧之(E. Bruce Brooks)、贾志扬(John Chaffee)、陈荣捷、苏珊·切尔尼亚克(Susan Cherniack)、布莱德·克劳夫(Brad Clough)、杜志豪(Ken DeWoskin)、伊沛霞(Pat Ebrey)、冯友兰、福克(Griff Foulk)、路易斯·戈麦斯(Luís Gomez)、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何伟亚(Jim Hevia)、卡布·赫斯特(Cappy Hurst)、南恺时(Keith Knapp)、孔丽维(Livia Kohn)、薇薇安·寇巴(Vivienne Kouba)、马特·莱维(Matt Levey)、唐纳德·洛(Donald Lowe)、约翰·露西(John Lucy)、梅维恒(Victor Mair)、丸山真男(Masao Maruyama)、南希·普赖斯(Nancy Price)、瑞丽(Lisa Raphals)、罗思文(Henry Rosemont)、哈尔·罗斯(Hal Roth)、鲍勃·沙尔夫(Bob Sharf)、夏含夷(Ed Shaughnessy)、史景迁(Joanthan Spence)、玛里撒加·苏姐(Maryška Suda)、唐小兵、巴泽·提瑟(Buzzy Teiser)、斯蒂芬·托拜厄斯(Stephen Tobias)、王瑾、汤姆·威尔森(Tom Wilson)、司徒安(Angela Zito),特别还要提到的是张隆溪。

我还受惠于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图书馆及其他机构。在旧日造访台北“中央图书馆”时,我受到了格外的关照。在位于昆明的云南省图书馆,我所获得的权限可以自由使用它馆藏的有关古代和中古哲学的图书,对于研究者来说,该馆堪称是块宝地。正是在该馆已退休的副馆长杨五美副教授的安排下,我才有机会一睹该馆令人惊叹的馆藏古籍。我的研究也因该馆历史文献部馆员王水乔和郭靖的专业协助而一帆风顺,他们帮助我查找了所需要的每一条书目,经常十分热情地将找到的书送到我的案头。十分感谢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惠允我从该馆版画馆复制使用《路易大帝诞生时的宇宙体系》(Le Système du monde au moment de La Naissance de Louis le Grand)这幅木刻画。

在美国,在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善本特藏室负责人爱丽丝·洛兰特(Alice Loranth)的安排下,该馆慨允我查用并影印约翰·格里斯伍德·怀特藏书(John Griswold White Collection)中的耶稣会文献。加州大学的班克洛夫特图书馆慷慨许我查用有关中国的早期著作。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密歇根大学哈兰·哈彻研究生图书馆(Harlan Hatcher Graduate Library)珍本特藏部慨允影印相关馆藏。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科罗拉多大学亚洲图书馆、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范·佩尔特(Van Pelt)亚洲图书馆,馆藏都极为丰富,使我受益颇多。我尤其应该感谢卡尔·卡勒(Karl Kahler),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方面的目录学家,很关注我的研究并为众多研究东亚的学者提供了不懈的帮助。

xiii

这些年来,各相关机构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文理学院于1989年为我撰著此文提供了暑期研究资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所与中国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办公室和专门的帮助。在马文·劳福林(Marvin D. Loflin)的支持下,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文理学院,通过暑期研究资助和新进教员发展奖等方式,为我的研究和文稿的最终修订出版提供了赞助。该校学术及学生事务副校长办公室,先前在乔治亚·莱西-劳里(Georgia Lesh-Laurie)主持期间,曾为我参加相关会议提供了旅费上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密苏里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和佛罗里达大学三校的历史系教员们，我有幸与其分享我的研究而获益良多。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历史系的同事们，是任何一名历史研究者所能祈求到的最好的，我很荣幸能有机会与他们合作共事，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有弗雷德里克·艾伦(Frederick Allen)、迈克尔·迪塞(Michael Ducey)、马克·福斯特(Mark Foster)、汤姆·诺埃尔(Tom Noel)、迈拉·里奇(Myra Rich)和吉姆·伍尔夫(Jim Wolf)。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亚洲与中东研究部，在我修改本书的最后那段时间为我提供了非常温馨的住处。我的同行们，梅维恒和夏南悉(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还为我举办了一场讨论热烈的系内论坛，使我有机会阐述自己的想法。

受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新儒家研究”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激励了我继续思考本书所探讨的有关“传统的发明”的问题；说到这儿，我还要感谢我的好友康拉德·希诺考尔(Conrad Schirokauer)和安·玛莉·萨托(Anne Marie Satoh)，他们是该研讨会的主席和会议报告人。会后的有关讨论，我则受惠于康拉德、安·玛莉·加里诺(Marie Guarino)、鲍勃·海姆斯(Bob Hymes)、张格物(Murray Rubinstein)、亚瑟·蒂得曼(Arthur Tiedeman)、雅勒·维希弗格(Jaret Weisfogel)和狄百瑞(Ted de Bary)。

科罗拉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生经常会就一些想法与我沟通，有一些想法对我很有启发，他们是理查德·伯登(Richard Burden)、罗伯特·费舍尔(Robert Fisher)、阿里·莱文(Ari Levine)、萨拉·戴维斯(Sara Davis)、布赖恩·雷伊(Brian Ray)和罗莎琳·布莱德福特(Rosalind Bradford)。很高兴看到他们学术精进、个人成长，也很高兴回想起他们(特别是理查德)如何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艾丽莎·霍兰(Elisa Holland)是我最优秀的本科学生，为准备庞杂的索引，她一直不知疲倦、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杰出成果怎么称赞也不为过。在为此费心劳神的过程中，她还得到了理查德·伯登的得力协助。我对他们两位深怀感激，相信本书的读者们也会感谢他们。

很多人都热心地帮助我,对他们的感激难以言表。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借此机会一敞心扉,表达我对家人和朋友的谢意,因为他们为本书问世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哪怕这种感谢总显得欠了那么几分。

在过去的四年里,本书编辑肯·威斯克(Ken Wissoker)一直耐心而又细心地关照本书的出版。他对本书一直抱有信心,很信任我的研究并且努力将它呈现在大家面前,他的这番信任令我感激得无以言表。本书问世还应该感谢两位热心的读者和他们的批评建议。我尤其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莫拉·海(Maura High),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使本书大为增色。宝拉·德拉戈斯(Paula Dragosh)在本书的编辑上尽心尽责,使原本枯燥乏味的编辑校对工作变成了一件乐事。

过去十六年来,我与学界同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与他们就整个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进行了热络的学术交流,我想借机感谢一下约翰·尤厄(John Ewell)和奈德·戴维斯(Ned Davis),他们总是乐读拙著各章并给出建议、指点和需要补充的其他观点。他们的情谊和指导一直都是照耀我前行的灯火。

我还对很多朋友亏欠许多,主要有:斯蒂芬·克拉克(Stephen J. Clarke),他和我一样为我总算完成了堪称“毕生志业”(Lebenswerk)一部分的这本书而兴奋不已;迈克尔·科鲁姆霍斯(Michael Krumholz)一直对我的学术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事实证明他是最敏锐的一位听众;哈尔(Hal)和丽莎·阿卡(Risa Aqua)就像是关怀我的长者,又像是才艺卓绝的高人,还是在道义上不停给我谆谆教导的好心人,一直给我以鼓舞和启发;约翰(John)和丽塔·伽斯巴洛(Rita Gasbarro)为我的女儿们提供了家一般的温暖,也为我能够富有成效地讨论16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的生平与著述提供了环境;谈到我的朋友及与他们的友谊和学术交流,就不得不提到蒂莫西·瑞特(Timothy Ritter),正是由于他风趣、富有建设性而又非常诚恳的批评,才使我在过去四年内能够在认识上保持清醒。

我还得感谢我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布鲁斯特·菲兹(Brewster Fitz)和卡罗尔·莫代尔(Carol Moder)是我女儿埃

琳娜(Elena)的教父教母,他们总是有无穷的智慧并且妙语连珠。如果没有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帮助,这本书可能还要费上许多时日才能完成。

罗伯特·迈尔(Robert Mayer)和伊丽莎白·威廉姆斯(Elizabeth Williams)两人都是我的同事,是我另一个女儿汉娜(Hannah)的教父教母,在过去的九年里,他们对我和我的家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在精神上给我们以指导,为我们加油打气,坚定地站在我们身边支持我们,帮我们照看孩子,与我们共同进退,还对我们提出了批评指导和意见建议。我十分珍惜和怀念这些年来我们两家在一起共同成长的点点滴滴。

我的朋友马克·费彻曼(Marc Fitzerman)和爱丽丝·布鲁(Alice Blue)是我个人修养上的良师益友,他们在精神道义上鞭策我,使我能够始终专注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当年吕西安(Lucien)和邦妮·米勒(Bonnie Miller)还在中国西南地区旅行时就已成了我灵魂上的知己,有时候他们会提出许多触及心灵的问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我孩子的爱,他们也总是一再提醒我,生活乃是一门艺术,虽然天下熙熙攘攘,但真正值得追求和维护的也就只有极为重要的一小部分。

xv 要想恰如其分地反映和肯定塔米·摩尔(Tami Moore)对本书作出的贡献可能需要花费很大的篇幅,因为她帮助我整理了本书的参考书目,一遍又一遍地听我唠叨书中的每个观点,并且就如何更好地表达这些观点给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她热爱学习,热爱生活,许多年来还一直同我的家人分享在这两方面的心得,为此我谨向她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其实,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你自身一部分的事物表达感情,反而更难言述;而赞扬那些将自己无私奉献给你的人也总有一点不自然。家庭就其本质而言,乃是给予而非追求相应的回报。但还是请允许我先谢谢我的妻子布鲁姆一家(Blums),他们多少年来从没放弃鼓励我并一直保持乐观。就我身边的家人而言,我的姐姐安妮·玛丽(Anne Marie)对我的学术事业表现出了他人不可比拟的热情。而对我攻读研究生和从事早期科研工作的那十六年而言,我的父母米勒德(Millard)和格洛丽亚(Gloria)一直都

倾尽全力,给予我最多;他们将我的事业视为己出,逐渐爱上它并投身其中。但我最想感谢的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并使之充满了爱,感谢他们使我得以顺心遂愿选择这条道路。

但我感觉,对我而言,最大的奖赏、最珍贵并且毫无疑问比其他一切都重要的,是我妻子苏珊·布鲁姆(Susan Blum)和女儿汉娜(Hannah Neora)、埃琳娜(Elena Oriana)的爱,这远比生活本身更为美妙。爱妻苏珊是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多少年来她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我的身上,帮助我编辑、校订、反思和将观点理论化,她还经常同我一起讨论,督促我继续我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她还给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议。恰当来说,是她和我一起成就了本书,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她将自己的勇气、敏锐、心气和力量与我一同分享,而且无怨无悔。

宝贝女儿汉娜和埃琳娜是我们俩世界的中心,她们常常不经意间给我一个吻、一个拥抱、一声欢笑、一句柔语,使我精神焕发,为我注入活力。事实上,正是她们在生活中的快乐提醒了我,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快乐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和她们的妈妈比太阳的光芒更能让我精神焕发。上述所言也许有点矫情、拙劣,却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这种感激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情难自禁地写下了上面的话。而我对她们的爱和感谢之情,毋宁说是一种祝福才更为恰当。可以说,正是由于深怀这一祝福之心,我愿将拙著献给她们,是她们的爱才使我有了生命,也使我的生命有了意义。

附 注

xvii 除某些引用的章节外,本书全篇使用了汉语拼音系统。中国作者的姓名及其著作名称中 useful 威氏拼音法(Wade-Giles)注写的情况未予修改,但在参考书目中给出了对应的汉语拼音形式。本书中经常出现的以罗马字母形式出现的中文语词,在附录中给出了中文书写形式和相应的解释。有些中文传统经籍是结集出版的,本书在引用这些文献时基本还会在页码之外另注上它是出自哪一卷。而一些年代较为古老的文献在集成丛书重新印刷时,往往会一页分上下两栏,故本书在引用这些文献时将以“.1”“.2”这样的方式指明它是在某一页的上栏还是下栏。在注释部分前的缩略语注解里,可以找到本书常用文献和丛书的完整书目信息。所有年份都被转换成了公历并标注上了“公元前”和“公元”。除特别注明以外,文中的英译部分均由笔者完成。

中国历史纪年表^①

朝代与大致年限

xix

夏(传说中的)	前 1953—前 1576
商	前 1576—前 1046
周	前 1046—前 771
春秋	前 771—前 479
战国	前 479—前 221
秦	前 221—前 208
秦汉之交	前 208—前 202
西汉	前 202—公元 9
新	9—23
东汉	25—220
三国	220—280
西晋	265—316
南北朝	317—589
隋	581—618
唐	618—906
五代	906—960
宋	960—1279
北宋	960—1127
南宋	1127—1279
金	1115—1234

① 詹启华所列的这个年表与我们通用的中国历代纪元表有不少差别。——译者注

元(蒙古人统治)	1279—1368
明	1368—1644
清(满族人统治)	1644—1911
中华民国	1912—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黑体标出的乃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主要朝代

目 录

致 谢	(I)
附 注	(VIII)
中国历史纪年表	(IX)

导 言 “孔夫子”、孔子与现代想象	(1)
-------------------------	-------

上 篇 制造“孔夫子”和“儒教”

第一章 耶稣会士、“孔夫子”与中国人	(47)
第二章 又一个轮回：耶稣会士及其著述 在中国和在欧洲	(121)
楔 子 “儒教”的意义及其使命： 对概念可靠性的思考	(211)

下 篇 澄清“儒”的意义与虚构一个孔子

第三章 古代文献，现代叙述： 民族主义、复古主义与“儒”的再造	(233)
第四章 殊相即共相：胡适、“儒”以及 中国人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337)